

对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

张学继

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，成果很多。但仔细检讨之下，又觉得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答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仍有不少。本文拟对其中的三个问题作些探讨。

一、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

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是研究西安事变史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台湾学者李云汉在其所著的《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》一书中，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中共的统战工作，认为完全是中共“实施统战政策所产生的成果”。（见该书前言）这种看法未免反客为主，其失于偏颇是显而易见的。大家知道，二、三十年代，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的反蒋运动此伏彼起，司空见惯，难道都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结果吗？

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当时的两个地方实力派首领张学良与杨虎城。笔者认为，要正确地揭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，就必须从分析张、杨两人与蒋介石的矛盾入手，而不是相反。

第一、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。

杨虎城，陕西蒲城县人，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。1929年第一次蒋冯战争中，杨虎城率所部二十一师脱离冯玉祥，投奔了蒋介石。1930年蒋、阎冯中原大战中，杨虎城参加了对阎冯的作战，被蒋介石提升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。杨率部转战入陕，于11月占领西安，驱逐了冯玉祥在陕西的残余势力，从而摧毁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根据地。中原大战结束后，蒋介石暂时承认了现状，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，并兼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。从此，杨

虎城成了统治一省的地方实力派。

从主陕之日起，杨就与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杨虎城抱有“大西北主义”的雄心壮志，他想以陕西为基地，进而控制甘肃、新疆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，同时，与陕北的苏区配合起来，自成局面，与蒋介石对抗。据载“当时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知情人士把这一方针称为‘开后门’，意谓潼关是前门，打开与苏联的通路即为后门。如能同苏联接上关系，便可公开对抗蒋介石，一旦力不能支，即可率部队退驻甘肃，暂时放弃陕西，以待时机”。^①针对杨虎城在西北的扩张，蒋介石则采取“四面遏制，内部策动倒戈”的策略以限制和消弱杨虎城的势力。

杨部一入陕西，蒋就在潼关设立行营，负责西北军事，以嫡系顾祝同为行营主任，率部进驻潼关、华阴、华县一带，控制了陕西的咽喉地带。1931年，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等人拥戴下野军阀吴佩孚出山，在甘肃发动叛乱。叛乱发生后，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兵入甘，平息了叛乱。按照惯例，甘肃省主席一职应由孙蔚如担任。杨虎城几次呈请以孙为甘肃省主席，但蒋仅委孙以甘肃宣慰使名义，将省主席一职给了他的秘书长邵力子。孙蔚如入甘后，杨虎城扶持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，帮助马进兵新疆。杨拟俟马仲英占领新疆后，再设法与苏联打通联系。但马部入疆不久，就遭到惨败，马本人也下落不明。不久，蒋又扶植甘肃地方势力，将孙蔚如挤出了甘肃。这样，由于蒋介石的抵制，杨虎城“打通西北，背靠苏联，联合中共进行反蒋的计划归于失败”。^②

1932年，蒋派马鸿逵率部回宁夏任省主席，以牵制杨虎城。1933年5月，蒋介石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职务，仅保留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，另委邵力子为陕西省主席，以进一步削弱杨的势力。蒋介石对杨虎城采取这种态度，这

① 米晋沉，《杨虎城将军传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54—55页。

② 米晋沉，前揭书，第55页。

是杨所不能忍受的耻辱。当时，杨就气愤地说：“官不做没有关系，这种作法太恶劣了。”^①这一做法更加强了杨虎城反蒋的决心。

不过，这一时期尽管杨虎城与蒋介石有明争暗斗，但尚未达到破裂的程度。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是在1935年以后。

1934年12月，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以后，南京政府开展“和平统一运动”，“以谋全国真正之统一和平”。^②这个和平统一运动的重要内容，就是要结束西南、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独立、半独立状态，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。特别是从1934年底起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撤离苏区，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机，大施一石两鸟的政策，即严令地方实力派与红军拚消耗，然后蒋指挥中央军趁机夺取地方实力派的地盘。^③正如蒋介石所承认的：“我亲自督率军队，不断追剿，一面剿匪，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，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，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。”^④

① 米哲沉：前揭书，第60页。

② 荣孟源主编：《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》，下册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244页。

③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策略，过去国民党官方史学界一直避而不谈。1989年蒋纬国出版了《抗日战争指导》一书，正式肯定了蒋介石的这一策略。他说：蒋介石“已想到以国军之‘持久’击破日军之‘速决’，因而须建‘大后方’于中国西南之川、贵、云地区。但是当时在该地区之地方势力仍有极壮大的自立性；中央为求内政之安定，迄未强行派军西进，以促基地建设。我虽未见到官式之记录资料，但在一个野战战略学者的立场，应可想见蒋委员长在第五次江西剿共时，为何诱迫中共残部向西南逃窜。在毛首率部进入边区时，中央军就自然地应当地之请，而进入了川、贵、云地区。从此也就开始融洽地建‘大后方’，为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定的基础。若不是为此，当年蒋委员长尽可能压迫毛匪东窜海边而捕歼之，或者当其西窜时作超越追击而捕歼其残部于进入西南之前。”见蒋纬国：《抗日战争指导》，香港远流出版公司，1989年版，12—13页。

④ 秦孝仪主编：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抗日战争时期》，续编（一）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，第745页。

台湾学者称1934、1935年两年是“‘安内’丰收的年代”。^①事实也是如此。1934年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，直接控制了福建。同年冬，中央红军开始从各根据地撤离，蒋介石又完全控制了鄂、豫、皖、赣等省。接着，又借追击红军之机，搞垮贵州地方军阀，控制了贵州。紧接着，蒋又把触角伸进了四川、陕西等省。

陕西省，是蒋介石绝对想要控制的地区。因为在蒋看来，中日全面战争迟早会来，而中日一旦开战，东南沿海势必守不住，到时政府必须迁往内地，所以，必须在内地及早建立根据地。1935年，蒋介石曾设想：“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，以洛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宜昌、常德为最后阵线；而以四川、贵州、陕西三省为核心，以甘肃、云南为后方。”^②在稍后国民党制订的1936—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中，再一次肯定了这一设想。^③在上述被蒋介石视为核心基地的川、贵、陕三省中，除了普遍具有地理位置好这个有利条件外，四川有成都平原，陕西有关中平原，物产丰饶，确实是支持长久战争的良好基地。所以蒋介石说：“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”，是“御侮复兴之根据地。”^④蒋的亲信、军政部次长陈诚甚至认为：“以国防全局论，吾国不欲复兴民族则已，如欲复兴民族，西北实为全局之关键，而长江流域，则只能算得偏安，即以号称‘天府之国’之四川而言，年来群目为复兴之根据地，然而以诸葛亮之鞠躬尽瘁，六出祁山，终于无功，姜维继之，九伐中原，竟归失败，可见形势之胜，究属不如西北远甚。今后为保障

① 陈存恭：《从“两广事变”的和平解决探讨“安内攘外”政策》，台北近代史所编《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册，1985年版。

② 张其昀：《中华民国史纲》，第4卷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，1954年版，第211页。

③ 参见马振犊：《1936—193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作战计划剖析》，《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档案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

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：《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》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33—134页。

华北、屏障中原，以及恢复东北失地计，均非特别重视西北不可。”^①由此可见，将陕西置于国民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，是蒋介石的既定目标。

但自1930年中原大战，蒋介石打垮国内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冯玉祥后，紧接着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、一二八事变、华北事变，南京政府内部又有蒋介石、胡汉民争权的约法之争，宁粤对立等，这一系列事件，把蒋介石搞得焦头烂额，使他暂时无力顾及西北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仍未忘记西北。他除极力抑制杨虎城在西北的扩张外，又在开发西北、建设西北国防基地的口号下，为最后控制西北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。

1932年3月5日，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，通过决议，以长安为陪都，定名为西京，“以为开发西北、巩固国防，且为西部人民增进经济与文化之基础”。^②6月，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，以居正、覃振、刘守中、杨虎城、于右任等19人为委员的西京筹备委员会，负责西京的筹建工作。11月15日，由蒋介石、吴稚晖等人向国民党中央建议，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。国民党中央曾设想“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，立即准备迁都长安”。^③与此同时，南京政府还大量投资于西北，从事交通、铁道、水利等建设。据蒋介石透露，从1934年起的三年里，南京政府在西北的投资达1亿元以上。^④陇海铁路在这时向西延伸，到达西安，川陕公路也建成通车。所有这一切，都是为以后直接控制陕西作准备的。

1935年底，红军到达陕北。蒋介石除严令杨虎城“剿共”外，又调集大批嫡系部队，准备开进西北。对于蒋介石以“剿

① 陈诚口述、柳克述笔记：《西安事变回忆录》，刘绍唐主编：《传记文学》，第53卷第6期。

② 摘自：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、行都与陪都》，《团结报》，第1236号。

③ 张力：《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》，台北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18期，第177页。

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，《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》，第133—134页。

共”为名，行抢夺地盘之实的用心，杨虎城是看得非常清楚的。他在私下里曾对部下说过：“民国初年，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为名，派陆建章率北洋军入陕。结果，对白朗没有怎么样，却把张凤翔赶下台去，消灭了张原来用以进行辛亥革命的部队。蒋介石师袁世凯之故伎，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尾追堵（截）红军之机，进入四川、贵州，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。这一次蒋调集大批军队来到陕西，对红军进行围剿，究竟能发生多大的作用，我看很成问题。对他的大军压境，企图一石三鸟的用心，不可不防。我们这么一点力量，所赖以存在的原因，一是九一八事变以来，蒋介石对外对内搞得焦头烂额，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；二是我们扎根自己的家乡，除部队外，还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；三是我们的北面有共产党的红军，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，搞得不好，会把我们逼上梁山。现在蒋介石抹下脸来，对外不惜任何屈辱，对内不顾一切舆论，要对共产党孤注一掷。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，一纸命令，甚至几句话，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、安徽那些地方，三天一改编，两天一归并，很快会被肢解消灭。你们必须注意，提高警惕，不要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只是对付共产党，要看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又一祸心。现在，我们面临生死安危的关头，……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对付蒋介石的办法。”^①这种情况表明，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，迟早会爆发。

第二、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。

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第二代首领。1928年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，炸死了他的父亲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。1931年，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侵占了东北四省，把东北军赶出了自己的家园。所以，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，对日本有着强烈的复仇意识。

但是，张学良感到，单凭东北军，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

^① 孔从洲，《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》，载吴福章编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161—162页。

者。他说，东北军如果“孤军作战，我小敌强，无非是徒然牺牲”。①又说：“我们是主张抗战的，但须全国抗战，如能全国抗战，东北军在第一线抗战，是义不容辞的。”②可见，保存东北军实力，等待全国抗战的到来，以便打回东北老家去，这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根本指导思想。

东北军是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带有浓厚封建性和地方色彩的部队，除了张学良外，谁也指挥不动。张学良虽有恩于蒋，但在蒋看来，东北军同样也是一支需要加以防范和削弱的杂牌部队。

1935年10月，蒋介石发表张学良为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，代行总司令职权，节制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四省军政事宜。对于去西北“剿共”，张学良是没有思想准备的，一则他不愿打内战，二则西北是别人的地盘，所以很感为难。他说：“西北苦寒，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，简直是逼人跳井。”③但张学良部下却极力主张接受去西北的命令。黎天才对张说：西北是我国远祖发祥的摇篮与待开发的处女地，接近中共，也可以与各方反蒋势力联合，必要时可以和蒋介石翻脸，分治割据，西北可以成为抗日后方基地。④在黎天才等人的启发下，张学良也感到可以借此机会，“把分散在关里的东北军利用执行‘剿匪’的任务的名义，集中到西北由自己掌握起来，保存实力，准备抗日”。⑤于是，他就接受了去西北“剿共”的任务。

张学良受命后，东北军除万福麟的五十三军驻河北外，其余五十一军、五十七军、六十七军、一〇五师及骑兵军共14个步兵师、4个骑兵师，约20万人，全部开驻陕甘。

在张学良看来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，实力已大为

①②③④ 张魁堂：《张学良传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81页，第124页。

⑤ 剑方：《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》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《西安事变资料》，第2辑，第160页。

削弱，不难在短期间剿灭。当时，东北军流行着这样的论调：“打日本不行，打红军没有问题。”^①因此，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红军一开始是非常卖力的。1935年9月，张学良调集10万兵力，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。刘志丹、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采取诱敌深入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先后歼灭了东北军一一〇师的六三〇、六二九两个团的5个连，打死师长何立中。10月10日左右又歼灭一〇七师的六二一团两个营的大半。10月21日，又在陕北郿县榆林桥战役中，歼灭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和六二一团的1个营，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。11月下旬，张学良又指挥5个师兵力，向陕甘根据地再次发起进攻。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下，红军组织了直罗镇战役，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，在追击中又歼灭一〇六师1个团，彻底粉碎了这次围剿。在三个月的围剿战中，东北军建制部队被歼灭两个师两个团又一个营，实际损失的兵力几乎是两个完整的建制师，两名师长阵亡，两名师参谋长、6个团长非死即俘。如此惨重的失败，在东北军历史上是少有的。东北军的惨败，极大地震动了张学良。张学良后来说：“陕北剿匪失利，……使良心中倍增痛苦，更加深良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，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，遂触动用‘和平’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。”^②

事后，张学良向南京请求补充武器装备，恢复一〇九、一一〇两个师的建制，并对阵亡的两位师长每人发十万元的抚恤金。本来，南京政府曾有通令：“凡因剿匪损失各部，绝不取消番号，并且立即补充。”^③但南京政府接到张学良的请求后，全部批驳，两个师的番号明令取消，缩减军费。对于抚恤阵亡师长的

① 转引自施文魁，《西安事变爆发原因及张学良在事变中的作用》，《沈阳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，1985年第1期。

② 张学良，《西安事变忏悔录》，转引自司马秉乾著《张学良评传》附录二，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，1986年版，383页。

③ 刘心皇，《西安事变两主角：蒋介石与张学良》，载刘绍唐主编《传记文学》第53卷第4期，25页。

要求，何应钦也批了个“特恤碍难照准”。^①当西北剿总军需处处长将何批驳抚恤金的电文拿给张学良看时，张摇晃着那封电文气愤地说：“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！”^②

蒋介石的这些露骨做法，使张学良领悟到蒋介石是想“利用剿匪机会来消灭剿匪的部队”。^③张学良识破蒋介石的险恶阴谋后，感到极为寒心。他很伤感地说：“照这样下去，不要说没力量打回老家，连本身存在都成问题了”。^④

另外，东北军官兵强烈的厌恶内战情绪，也使张学良感到无法再进行内战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军的家园。自此以后，东北军背井离乡，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。东北军官兵内心强烈要求用手中的武器消灭日寇，打回老家去。他们经常向张学良提出这样的疑问：“为什么不打日本帝国主义，要与同胞残杀？”^⑤有的还说：“与红军打仗，死了不值得。在关内打红军，不如出关打日本，死了也是英雄。”^⑥东北军之所以连连惨败，士兵不愿打内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面对“兵不打，将不战”的局面^⑦，张学良必须考虑，如果继续打内战，部队是否还会服从指挥的问题。

严峻的处境，使张学良决心与红军停战，保存东北军的实力。

第三、蒋介石一意孤行，把张、杨逼上了梁山。

为了对付蒋介石的一箭双雕政策，各地方实力派加强了联系，他们试图联合起来，打破蒋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，立即停

^{①②} 王禹廷：前揭书，第214页。

^③ 《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》，台北，近代史研究所，1985年版，第66页。

^④ 栗又文：《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》，《西安事变资料》，第2辑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77页。

^⑤ 程海岑：《西安事变中的刘桂五》，《西安文史资料》，第1辑。

^{⑥⑦} 何柱国：《忆张学良将军》，《西安事变资料》，第2辑。

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广东的陈济棠，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，云南的龙云，四川的刘湘，陕西的杨虎城，山西的阎锡山，山东的韩复榘，河北的宋哲元及东北军的张学良（张是唯一失去了自己地盘的实力派）之间秘密信使往来，非常活跃。1936年前，蒋介石经略的重点是两广与西南。因此，广州便成了地方实力派密谋反蒋的大本营。当时，地方实力派“多有代表驻在广州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政治俱乐部”。^①

蒋介石在控制了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贵州四省后，两广即处在蒋介石中央军的包围之下。1935年，李宗仁要求中央军撤出贵州，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。^②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激化。1936年5月，胡汉民在广州病逝，南京政府派居正、孙科等八委员以祭胡为名赴广州，要求两广当局“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”。^③陈济棠怀疑蒋介石将在胡逝世后对两广用兵，遂密约李宗仁先发制人，首先打出了反蒋的旗帜。

两广六一事变后，陈济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先后密电张学良、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，要求他们出兵援助。杨虎城认为这是“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”的大好机会，因此非常兴奋。他说：“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，内战会停止，那时，蒋介石再不抗日，看他往哪里走！”^④杨虎城经与张学良商定，提出了以下三项对策：一、由张、杨分电蒋介石，要求停止内战，团结抗日；二、如蒋对两广罢兵，张、杨即提出停止一切内战，召开救国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，通电全国，征询意见；三、如蒋对两广用兵，张、杨即出兵援助两广。^⑤

但是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六一事变后，其他地方实力派反应均

^{①③} 刘斐：《两广“六一”事变》，《新桂系纪实》上册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。

^② 黄旭初：《共军西南之际中央图统一西南》，（香港）《春秋》，第125期。

^{④⑤} 王菊人：《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》，《陕西文史资料》第15辑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
很冷淡。除没有地盘与实力的李济深、蔡廷锴等下野人物通电响应外，山东韩复榘、河北宋哲元通电劝止双方停止军事行动，取中立姿态。①湖南何键、云南龙云、山西阎锡山也“皆劝两粤息争”。②因其他地方实力派不支持，张、杨也不便公开响应。不久，因陈济棠部下倒戈，两广事变迅速失败，只剩下桂系李、白退守广西一隅，聊以自保。这样，张、杨利用两广事变达到停止内战的希望落空了。

但是，张、杨并未因此灰心，他们决心另辟反蒋蹊径。

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，踌躇满志，把对付两广的嫡系精锐部队近30个师，统统北调陇海、平汉路，随时准备开进陕、甘，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解决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两支杂牌部队，切实控制西北。

1936年10月22日，蒋介石飞抵西安，部署对红军的围剿。据郭增恺回忆，蒋介石第一次到西安召开“剿匪合围会议”。会后，张学良即愤愤不平地对一〇五师旅长唐君尧说：“蒋铭三（鼎文）今天在会中，对拟定的部署，也提出认为殊不合理。他说：

‘甘境既有于孝侯（学忠）指挥的东北军布防，何以重将朱益民（绍良）所部安置在其后背？新到中央各军何以不布置在原有前方各部间之空隙地带，以资合围，而重复布防于东北军各师附近？’坐在他身旁的陈诚却在桌子下面止之以足，不要他再说下去。”③蒋介石借“剿共”之机消灭异己的用心已昭然若揭。

起初，蒋以为由他亲自督战，张、杨是不敢违抗命令的。但出乎蒋的意料，张、杨不但不同意继续打内战，反而正式向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的主张，并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，而是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全体官兵的一致主张。张学良还把毛泽东、周恩来10月5日写给他的信向蒋作了

①② 陈存恭。前揭文。

③ 郭增恺：《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》，转引自刘心皇，前揭文。

转达。^①蒋介石气得大骂张学良“中了共产党的魔术”，并声称，“在杀尽红军、捉尽共匪之前，决不谈抗日的事”^②，态度十分骄横。因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，蒋即于10月29日从西安飞回洛阳，以“祝寿”为名，部署“剿共”。

当时，张学良还希望能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。因此他约阎锡山于10月30日借为蒋祝寿为名，到洛阳向蒋陈述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必要性。蒋回答说：红军“已成为强弩之末，只要大家努力，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，永绝后患”。^③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，蒋介石就是不接受。最后，蒋听得不耐烦，板着面孔说：“是我该服从你们呢？还是你们该服从我？”^④话已至此，张、阎二人只好表示服从委员长而退。11月1日，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，蒋介石又对张学良旁敲侧击，说什么“勾结日本者是汉奸，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”。^⑤张学良知道蒋这些话是针对他而说的，顿时神色大变。会后，连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认为这些话“太过火了”。^⑥张学良屡次进言失败，又遭辱骂，情绪非常冲动。据张学良后来回忆：“迨自良从洛阳返来，心情十分懊丧，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，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，并问计于杨，彼有何高策，可以停止内战，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。杨反问良，是否真有抗日决心？良誓志以对。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，余等可行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之故事。良闻之愕然，沉默未语，彼露有惧色，良即抚慰之曰：‘余非卖友求荣之辈，请勿担心，不过汝之策，在余有不能之者。’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，以私忘公。良答以‘容余思考商讨，请其安心，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以私忘公。’良答以‘容余思考商讨，请其安心，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以私忘公。’

^① 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信中要求张学良“当机立断，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，并折将敵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，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”。见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78—79页。

^{②③④} 李金洲：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第24页。

^{⑤⑥} 何柱国：《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》，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。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4—5页。

及彼之意见也’。”^①显然，这时张学良还没有扣蒋的思想准备。不过，他答应考虑杨的意见，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。

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自动与红军停战，也引起了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注意。军政部次长陈诚并向蒋建议“将东北军调出潼关，分驻豫皖各地”，同时将“豫皖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委员长开封行营，以张学良为行营主任，藉作曲突徙薪之计”。陈还建议蒋“最好驻节洛阳，短期不动”，或者“进驻平凉”，而西安已“决非宜于驻节之地”。^②当时在场的陈布雷、贺耀组、何廉等人也“一致表示赞同”。^③但蒋介石抱着“谅他（按，指张学良）不敢对我怎么样”的骄横心态，没有接受陈的劝告。^④12月4日，再度来到西安，驻节临潼华清池。

蒋介石一到临潼，就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、师长等高级将领，用餐叙的方式，进行拉拢安抚，却不让张、杨参加。蒋要他们服从命令，继续“剿共”。当时，张、杨已经知道蒋有两个方案，让他们选择。第一个方案是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服从“剿共”命令，全部开赴陕甘前线，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，中央军在后面支援接应；第二个方案是：如不愿“剿共”，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，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，让中央军去“剿共”。蒋介石这两个方案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呢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说：“第一个方案，是想驱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前锋，中央军在后面督战。这是置两军于死地，不论胜败，终归于尽；第二个方案，拆散两军，是蒋介石对付十九路军的故伎重演，目的在于分别整垮。因此，这两个方案，不仅张、杨无法接受，就连我们这些将领也不愿接受。”^⑤

① 张学良，《西安事变忏悔录》，司马秉乾，前揭书，第388页。

②③ 陈诚口述、柳克述笔记，前揭文，第15页。

④ 刘心皇，前揭文，第27页。

⑤ 何柱国，《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》，转引自刘心皇《西安事变两主角：蒋介石与张学良》，第28页。

杨虎城在布置兵谏行动时也对部下如是说：“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，一意孤行，坚持内战，……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大举‘剿共’，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！”^①

很明显，在这种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的情况下，张、杨除了反蒋，别无选择。

从根本上看，西安事变是张、杨和蒋介石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。因此，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。中国共产党对张、杨的争取，三位一体的形成只是为张、杨反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。但是，西安事变以扣蒋的方式出现，则又是由张、杨两人的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。

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尽管出身、经历与个性非常不同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做事果断，敢作敢为，不是那种优柔寡断之辈。1929年，安徽省主席石友三反蒋前，恰巧蒋介石路过安庆，并且做了石就职安徽省主席的监督人。蒋走后不久，石友三就炮击南京下关，通电反蒋。杨虎城当时曾嘲笑石友三说：“石汉章（按，石友三号）这小子被蒋介石的偶像吓倒了。既然要反蒋，为什么蒋到安庆时不把他抓起来，而蒋刚走又来这么一手？石汉章太没出息！”^②这个例子说明，当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无法调和时，他是善于谋算决断的。

无独有偶，据栗又文回忆：在1936年8月间，张学良派栗又文去新疆联络盛世才。行前，栗问张：“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？”张说：“我可以劝。”栗说：“你劝他不听呢？”张说：“可以再劝。”栗说：“他还不听呢？”张一拍大腿说：“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！”^③

既然张、杨两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，那么，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。

①② 米慎沉，前揭书，第120页，第118页。

③ 栗又文致史永信，1982年7月13日。转见张魁堂：《张学良传》，第194页。

二、张学良为什么匆忙送蒋回南京？

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的。事后，张、杨又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、博古等共商善后，事实上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在放蒋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，理应通过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和中共三方最高级会商，决定释放蒋介石的方式与时间。可是，张学良不这么做，他在没有征求杨虎城和周恩来完全同意的情况下，自作主张，悄悄地送蒋离开了西安。张学良为什么要采取异乎寻常的方式？

有人认为，这是张学良“急于向南京中央表白自己，发动事变乃一心为国，毫无个人动机，便轻率地自作主张，亲自送蒋回南京”。^①笔者认为，虽不能排除张学良有向南京中央表白自己的想法，但那决不是张学良匆忙送蒋的主要原因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从张、杨扣蒋后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去寻找。

第一、杨虎城坚持放蒋应有先决条件，僵局无法打开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、杨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。从张学良来说，最主要的是要蒋介石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因此，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，就算基本上达到了目的。那样，就不仅要放蒋，而且要帮助他恢复威信，以便他日后能领导全国抗日，这是张学良的基本思路。12月12日晨，在等待捉蒋消息时，张学良就对杨虎城等人表明了他的心迹，他说：“若找到委员长，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，我一定拥护他，并自己请罪，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；若找不到他，我便将头割下来，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，了此公案，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。”^②张学良以后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表示，只要蒋介石

^① 张同新编著，《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457页。

^② 何柱国，《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》，前揭书，第5页。

同意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就送他回南京，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。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，张学良在扣蒋后，对蒋仍“执礼甚恭”^①，对蒋仍保持平日上下级之间应有的礼节，他真诚希望能够说服蒋介石接受他们的主张。12月22日下午，宋子文、宋美龄兄妹来到西安，代表南京方面与张、杨进行谈判。当天，张学良在会见宋美龄时即表示：“他绝无伤害委员长的意思，而且一不要钱，二不要地盘，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，签不签文件都可以。”^②从23日起，宋子文代表蒋方，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，在张学良公馆开始谈判。经过两天的谈判，双方达成了十点协议。

谈判结束后，蒋介石对张学良表示，他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，释放“七君子”，联红容共，改组国民党，联俄、英、美等，在改组政府方面，要孔、宋与张商定名单，中央人员离开陕、甘，令何应钦出洋。^③至此，蒋介石口头上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。

张学良认为：既然蒋已答应了西安方面的条件，发动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就应当尽快放蒋；不仅要放蒋，而且要送蒋，以便使他恢复领袖的威信。24日，张学良对设计委员会成员说：“这次事变对他（按，指蒋介石）是个很大的打击，所以要给他撑面子，恢复领袖威信，好见人，好说话，好做事。”^④

然而，杨虎城对蒋的态度就不那么简单。杨的基本态度是：“不扣则已，扣即不轻易放他。纵然不杀他，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。”^⑤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一再表示，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的抗日要求，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。对于张的这种表示，杨表面上虽不置可否，但他内心是不同意的。开始，杨把希望寄托在中

① 南菊隐，《蒋百里传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30页。

②③ 《西安事变简史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85页。

④ 何柱国，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，《团结报》第535号。

⑤ 高崇民，《西安事变杂谈》，《西安事变资料》第2辑。

共代表身上。他认为，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，是不会完全同意张学良的主张的。杨第一次见周恩来时，周表示：没有保证，不轻易放蒋。对此，杨很高兴。^①但不久，中共改变对蒋的政策，主张释放蒋介石，这大出杨虎城意料之外。所以，当时杨虎城的处境很微妙，正如申伯纯所描述的：

“论大道理，杨也承认他们说得对，可是一想到他个人和团体的利害，就不免有所疑虑。他深知蒋的为人狭隘偏私，毫无信义，睚眦必报。他过去同蒋的关系本来就搞不好，又加上这次事变蒋一定最恨他，饶了谁也不会饶了他。放了蒋，他今后怎样同蒋共事呢？不放蒋，他自己的想法又行不通。张学良同周恩来已经意见一致了，讲道理他们讲得对，论力量他们比自己大得多。但使他感到苦恼的是，如果照着他们的意见办，自己实在太危险。想来想去，心如乱麻，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。”^②

由于张学良和周恩来主张放蒋，杨虎城只好表示同意。但是如何放蒋呢，杨虎城的想法是，“必须抓到蒋介石的辫子”，“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乃至回头来打击报复”。^③那么，怎样抓蒋的辫子呢？兵谏之初，杨虎城曾和幕僚们商议，提出过以下几种设想：一、由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，就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；二、所谓“诺言”必须签字，但可以绝对保守秘密而不向外泄露；三、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一次广播讲话，或有一政治性文件，表明总的态度，不必涉及具体内容。^④

对于放蒋，中共方面也是主张有条件地放的。12月24日半夜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，其内容是：一、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，与民更始，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；二、全部中央军分向豫、绥两省撤退。三、部分的释放爱

① 参见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：《西安事变简史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89页。

② 申伯纯：《西安事变纪实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79年版，第151—152页。

③④ 米暂沉：前揭书，第168页。

国分子与共产党员。其中第一项是关键，只要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的表示，就等于承认了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，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。^①在放蒋的条件上，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想法比较接近。

那么，蒋介石能否接受这些条件呢？笔者以为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。原因是：

其一，让蒋介石发表声明，就等于让蒋承认完全放弃西北，将其交给张、杨和红军，这是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的。正如蒋介石1937年1月19日致杨虎城信中所声明的：中央“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”，“中央如放弃西北，即无异放弃国防，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，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，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。”^②25日下午，蒋介石在临上飞机前针对杨虎城等人心理，虚情假意地对杨说：“西北交给你们了，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，由你们负责。”^③蒋此时的表态是虚伪的，正因为是虚伪的，所以蒋不留下任何文字保证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声明：“不在谈判的决定上签字，以个人的人格作保证。”^④他实际上是为以后翻悔预留地步。

其二，退一步讲，即使强迫蒋介石作了某种承诺，南京方面照样可以寻找借口予以推翻。12月23日，孔祥熙致电蒋鼎文，要其转告张学良：“介公回京之后，不仅汉兄保卫介公之苦心可大白于天下，而彼等主张自亦不难商讨，容纳实施。否则，介公留陕，国人皆认其已失自由，即有容纳彼等主张之切实表示，亦认为出自胁迫，中央多数主张，决不容接受。”^⑤这就使张学良感

① 1936年12月24日24时中央书记处复周、博电，转引自《西安事变简史》，93—94页。

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：前揭书，第133—134页。

③ 米晋沉：前揭书，第170页。

④ 应德田：《张学良与西安事变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20页。

⑤ 杨天石：《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》（五），《团结报》1163号，1991年1月9日。

到，即使让蒋介石作出了保证，也毫无实际意义。

张、杨由于意见歧异，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。据张学良后来说：“因蒋公离陕问题，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，亦为此点，良责杨：‘我等最初动机，是不顾一切，请求蒋公领导抗日，……我等目的可达，不应畏首畏尾，患失怕死。既然如此，你反何必当初乎？’在此争论上，良言语急躁，几乎同杨决裂，乃系周恩来在座解围，劝良小加休息，容他会议商讨，被周将杨说服。”^①曾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端纳也说：“对于签字问题，张、杨之间也有争辩，……张曾对杨等威胁说：‘如果不能政治解决，张某将独行其是。’”^②毫无疑问，张、杨之间关于放蒋条件的争执，是促使张学良采取突然手段放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第二，张、杨部下杀蒋呼声很高，张学良担心出现意外。

从十七路军来说，不仅主帅杨虎城对放蒋顾虑重重，中下级军官对蒋更是“无不恨入骨髓”。^③特别是原来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将领，如担任十七路军参谋长的李兴中等人，对蒋“尤多报复思想”。^④他们都“主张把他（按，指蒋介石）枪毙”。^⑤

事变之初，蒋介石被关在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，由十七路军卫队营看管。张学良为了蒋的生命安全与杨虎城商定，将蒋移到与张学良公馆毗邻的高桂滋公馆，由张学良卫队营看管。这一安排，对保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

从东北军方面来说，高级军官如王以哲、何柱国、于学忠等人对放蒋虽也有顾虑，但他们基本上是服从张学良的命令的。24日，张学良召集王以哲、董英斌、何柱国三人，密告他要亲自送蒋的决定。开始他们三人都不同意送蒋，但由于张学良坚持己

① 张学良：《西安事变忏悔录》，司马秉毅，前揭书，第390页。

② 《西安事变资料选辑》，西北大学历史系编印，1979年，第479页。

③④⑤ 高崇民：《西安事变杂谈》，《西安事变资料》第2辑，30页。

见，王以哲等人表示服从，只是建议张学良“至多送至洛阳”。①可见，张学良送蒋在东北军高层军官中是通过了的。

但是，东北军内颇有发言权的少壮派却不那么服从张学良的命令。少壮派的头头应德田声称，放蒋“就是纵虎归山”，因此根本不赞成放蒋。② 24日下午，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（设计委员会成员包括应德田、苗剑秋、高崇民等人）。张学良在会上介绍了谈判情况，并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，他要亲自送到南京的消息。当即就有人问：“蒋、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？”张学良急问：“你们要什么保证？你说！你说！”气氛非常紧张。被问的人虽然紧张，还是把设计委员会提出的条件说了一遍，这就是：一、蒋离西安前必须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撤走，解除对西安的威胁；二、蒋离西安前，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，以取信于全国人民；三、谈判所通过的条款，必须由蒋介石亲笔签字，公诸报端，使他不至反复。“得不到这些基本保证，绝不能放”。③ 张学良指出，这些条件根本行不通，并说了他自己的看法。但张学良的这套说词，并没有把设计委员会的成员说服，会议不欢而散。

当时，有些激烈分子就扬言：“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，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。他们想捉就捉，想放就放，不行！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，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干脆先把他干掉！”④ 据当时任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的申伯纯透露，当时，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“在酝酿什么”行动。⑤ 不仅十七路军不稳，东北军“内部也有问题”。⑥ 关于这一点。笔者虽未看到更详细的材料，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，12月24日，张学良把他在他公馆担任警卫的孙铭九营调开，而改由他的副官长谭海指挥的侍卫队接

① 何柱国：《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》，前揭书，第6页。

② 高崇民：《西安事变杂谈》，前揭书，第35页。

③④ 应德田，前揭书，第120、121页。

⑤⑥ 申伯纯，前揭书，第158、161页。

替。① 孙铭九是少壮派头头之一，“二·二事件”的主要制造者，思想偏激。张学良此举，显然是出于对蒋安全的考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由于在放蒋条件上的激烈争论，张学良已无法控制局势。如果再拖延下去，事态如何发展难以预料。正如12月25日下午放蒋前，张学良对杨虎城所说的：“现在不走不行啦！夜长梦多，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。”②

鉴于杨虎城坚持先决条件，部下又不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张学良只好采取突然手段，悄悄地送蒋回南京。据王菊人回忆：“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，是张突然决定的，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。只是在蒋临行前，张才打电话请杨去。杨到了那里的时候，蒋已出来要上车了。张只低声对杨说，现在就放他。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，只好一道去送蒋。……杨没有料到张会亲自送蒋去，但此时已无法阻止。”③

对于张学良匆忙放蒋，乃至亲自送蒋，学术界有种种议论。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轻率和错误的，它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。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终生监禁，东北军的瓦解都由此而引起。④ 这种说法，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，但实际上不能成立的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，事实上张、杨只有两种选择，其一，不顾一切，杀死蒋介石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必然是导致全国性的内战。这种结局是当时大多数人包括张、杨都不愿看到的，因而也是不可取的。其二，是“不留痕迹”地放蒋，其结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。那种认为既要放蒋，又要保全张、杨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利益的看法是不现实的，因为，只

① 王禹廷：前揭书，443页。另一说，是张学良于24日加派副官长谭海率军士队警戒蒋介石的住所，以防万一。见高崇民：《西安事变杂谈》。哪一说正确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② 申伯纯：前揭书，第161页。

③ 王菊人：《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》，见吴福章编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，第157页。

④ 参见李新：《西安事变初探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1979年第11期。

要放了蒋介石，那么即使逼迫他做出了某种保证，蒋到了南京以后照样可以不认帐，随时都可以翻脸。对于这一点，张学良看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我们提出的条件，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，就让他走。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，签了字要撕毁，还不是一样地撕毁。”^①张学良明了问题的症结后，毅然决然采取“不留痕迹”的放蒋办法，这无疑是处置蒋介石的最佳选择，决不是什么轻率之举。

西安事变的结局也证明了张学良、杨虎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设想是一个失策。历史上，曹操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为他所挟持的天子汉献帝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，曹操完全可以利用他的名义去发号施令，以达到目的。而张、杨所扣留的“天子”蒋介石却是当时国民党主流派的领袖，拥有全国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。在实力对比上张、杨远不及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、杨即便不放蒋，也不可能利用蒋发号施令。所以，中共中央当时就曾指出：“张、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，以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。”^②由此看来，逼蒋联共抗日不一定要扣蒋。张、杨如果寻找别的途径，其选择余地或许会大得多，结果也可能大不一样。

三、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

西安事变爆发后，地方实力派的反应是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现有的论著说法多种多样。有的说：“一部分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支持张、杨举动，广西李宗仁、白崇禧和广东的李济深公开支持西安事变，……四川刘湘、华北宋哲元、韩复榘等都暗中支持张、杨。”^③有的说：地方实力派“主要的态度是：要求

① 申伯纯，前揭书，第160页。

② 《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》，1937年1月7日，载中央档案馆编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10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31页。

③ 李佩良，〈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〉，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》，1991年第3期。

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反对内战，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。这就给了南京主战派以很大的压力。”^①实际情况如何呢？

西安事变前，张、杨曾与各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联络，对于打破蒋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达成了共识，这也是促使张、杨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张、杨在扣蒋后，除公开通电全国，征求各方响应外，还于12月12日分别致电李（宗仁）、白（崇禧）、阎（锡山）、宋（哲元）、刘（湘）等人，向他们解释兵谏的真相和目的，15日，又派出代表分赴广西、山西、绥远、山东、四川，进行联络，希望从他们那里“获得强烈的赞许和实质的支持”。^②然而实际的反应是：

（1）山西的阎锡山。12日，张、杨连电阎锡山，盼阎支持，并为事前未同他商量表示歉意：“兹事甚急，事先不及与公商谋，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。”^③但阎锡山却认为张、杨此举“关系国家存亡”，决定不予支持。^④14日，阎复电张、杨，以四问相质，并指责张杨扣蒋是“以救国之热心，成危国之行动”，“增加国人的忧虑”。^⑤阎同时将此电转给了南京政府，用以表明他的态度。

南京方面获悉阎的态度后，即决定将“斡旋之任”托付阎锡山，付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。^⑥16日，中共中央负责人毛泽东也致电阎，建议他出面调停，先制止南京与西安双方的军事行动，

① 前引《西安事变简史》，第65页。

② 李云汉：《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》，台北，近代中国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167页。

③ 转引自傅虹霖：《张学良的政治生涯》，中译本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200页。

④ 《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》（五），台北商务印书馆，1988年版，第1974页、1976页。

⑤ 《革命文献》第94辑，第315页。

⑥ 孔祥熙：《西安事变回忆录》，《孔庸之（祥熙）先生讲演集》，下册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。

再商量善后。① 阎一面致电南京，表示要“竭尽绵薄，不顾一切，营救蒋介石出险”②，一面又对张学良的代表表示：“决本爱护国家、爱护领袖、爱护副司令、爱护东北军四大原则”行事，并决定派赵戴文与徐永昌两个去西安，与张杨“商谈解决当前危机”的办法。③ 对于阎的态度，张学良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，因此，他愤怒地表示“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”。④ 张学良对阎不再寄予希望，此后即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与阎周旋。阎锡山想抢救蒋第一功的希望自然也不可能实现。

（2）四川刘湘。在川系各派争斗中刘湘曾受到蒋的扶植。但自1934年底蒋派参谋团插手川政，刘湘面临着与张、杨相同的命运。两广事变期间，刘湘曾与张、杨信使往来，同意逼蒋抗日，并表示，愿与西北共同行动。⑤ 事变爆发当天，张、杨连发两电，促刘湘响应。但刘湘没有立即表态。14日，刘致电何应钦询问“政府应变处置”方针，除表示对川事“绝对负责”外，既不指责张、杨，也没有表示拥护南京政府，采取观望态度。⑥ 12月16日，刘湘召集川军五军长唐式遵、潘文华、王缵绪、邓锡侯、李家钰等举行防务会议。由于刘湘态度不明朗，引起南京方面的疑虑。孔祥熙、何应钦、顾祝同纷纷致函电刘湘，并派正在南京的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迅速返成都，劝刘湘表态拥护南京政府。为了安抚刘湘，南京政府于17日宣布任命刘湘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，以地盘引诱其表态拥护南京。18日，刘湘发表通电，提出“拥护中央”、“抗御外侮”、“弭息内战”、“营救领袖”四点意见。⑦ 20日，川军将领邓锡侯、刘文辉、孙震等联名发

① 转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：《中国现代史》，1987年第11期，第134页。

② 《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（五），台北商务印书馆，1988年版，第1974页，1796页。

③④ 李金洲，前揭书，第38页，第40页。

⑤ 栗又文，前揭文。

⑥⑦ 周开庆编，《刘湘先生年谱》，台北，四川文献研究社，1975年版，143页，144，145页。

表拥护刘湘通电，并致电张杨“促其速即觉悟，恢复领袖自由”。^①可见，刘湘对张、杨也不支持。

（3）广西李宗仁、白崇禧。事变爆发后，在西安的广西代表刘仲容于12日密电李、白，告以西安发生事变，并促白崇禧赴陕“共商一切”。^②李、白接到刘仲容的电报后，经过讨论，决定“暂取静观态度”。^③14日，李、白与黄旭初复电孔祥熙，对张学良扣蒋表示“痛惜”，并表示“决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皇”。^④

不久，桂系另一要角黄绍竑派陶钧到桂林，对李、白说：“蒋介石是不易于抗日的，张杨主张联共抗日，未免过于激进。最好李、白在南京政府与张杨之间居中折衷，找出一条中间道路。”^⑤李宗仁指示驻北平代表向宋哲元提出“反蒋联张”的主张，征求宋哲元等人的意见。^⑥由于宋哲元等态度暧昧，李、白支持张、杨的行动未能公开。

（4）冀察宋哲元。12日张学良密电宋哲元，请他或派一全权代表去西安“共商国是”。^⑦宋哲元一贯反共，当他得知张学良联共，表示不能理解。13日，宋复电张学良，提出两点所谓忠告：一、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，务与共产党绝缘；二、蒋委员长之安全，关系民族危亡，请负责维护。^⑧14日，宋还密电孔祥熙、何应钦，“请中央迅速戡定变乱，营救委座”^⑨，要求下令讨伐张杨。16日，又再电张学良，“请其悬崖勒马，以国事为重。对蒋委员长之安全，尤盼切实保障，早为护送回京”。^⑩可

① 周开庆编：前揭书，第143，144，145页。

② 孔祥熙，前揭书。

③⑤ 程思远：《李、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》，载《西安事变来历记》前揭书。

④ 转见王禹廷前揭书，第338页。

⑥⑨ 前引《革命文献》第94辑，第426页，第359—360页。

⑦⑧ 转见王禹廷前揭书，第334页，第335页。

⑩ 《有关西安事变重要电文补刊》，《传记文学》第40卷第5期。

见，宋哲元是拥护南京，反对张、杨扣蒋的。

(5) 山东韩复榘。事变后，韩采取两面派的手法，对南京呼吁营救蒋介石，并与所部五师长于14日联名通电，表示“誓以血诚，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，惟命是从”。^①同时又密电张、杨，表示“服从副司令，愿效前驱”。^② 23日，韩与宋哲元联名发表通电，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“三大原则”：第一、如何维持国家命脉？第二、如何避免人民涂炭？第三、如何保全领袖安全？并建议“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，在野名流，妥商办法，合谋万全无遗之策”。^③这个通电发表后，引起南京政府的“焦虑”。^④但这时，由于张学良已决定送蒋回南京，这个通电并未产生多大影响。

据孔祥熙事后查明，该电实为韩复榘所拟，韩征求宋哲元联名发表时，宋初本不赞成，经韩派人催促解释，而此时广西驻北平代表任援道、陈中孚等亦以反蒋联张向宋进言，宋始同意发出。如果西安事变一时没有解决的希望时，他们将有第二步的表示。^⑤但由于西安事变迅速解决，他们的计划也未能出台。25日，韩复榘获悉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的消息时，大感意外。在麻将桌上当着蒋介石亲信蒋伯诚的面，脱口说出“张汉卿做事何以如此虎头蛇尾”之类的话^⑥，种下了日后为蒋所杀的远因。

(6) 云南龙云。云南偏处边陲，蒋介石对其鞭长莫及，因此，龙云与蒋尚能相安无事。西安事变爆发后，龙云主张对西安“迅即凌之以兵，予以重大打击”。^⑦同时，他频频与各方联络，为营救蒋介石出谋划策，因而获得南京方面的赞赏。西安事

① 前引《革命文献》第94辑，第368页。

② 李金洲，前揭书，第34页。

③ 《革命文献》第94辑，第425页。

④ 《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》上册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4年版第523页。

⑤⑥ 王禹廷，前揭书，第337、338页。

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，前揭书，第249页。

变和平解决后，蒋的亲信陈果夫兄弟称赞龙云“拥护委座，遐迩同钦”。^①

综上所述，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作了各种不同的表态。有的明确支持南京中央，如阎锡山、宋哲元、龙云。有的持观望态度，如刘湘、李宗仁、韩复榘等。其中却没有一个人明确支持张、杨，而且“要求放蒋，成为一致的呼声”。^②张、杨原以为一旦他们扣蒋后，定会四方响应，故对事变后出现这种局面，殊感意外，也非常恼火。张学良曾对黎天才说：“我不反蒋时，大家都反蒋。我反蒋了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甚至叫我的倒好。”^③由于“外援无望，内部可虑之事尚多”^④，张学良因此而失掉信心，这也是张学良沉不住气，仓卒放送蒋介石的心理因素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？

最大的原因，是由于张、杨采取了扣蒋这种极端的办法反蒋。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担心，如蒋介石遭不测中国失去重心，中国便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可怕局面，因而对西安事变持保留态度。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北平，宋哲元立即召集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商讨应付对策。会上，秦德纯说：“这几年，蒋的有些做法虽然不能令人满意，但他毕竟还能统率得起来，如果他要有个意外，那时候，必然是各霸一方，国家就要四分五裂了。”^⑤秦德纯的这段话，代表了当时地方实力派多数人的认识。事变后，龙云、刘湘、李宗仁等人在私下里往返电商，筹划应付对策，大都不出这种考虑。阎锡山也认为：“今日介公之安危即国家之安危，转危为安，非救出介公不可”。阎还指出，历史上废旧主，另立“新

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：前揭书，第287页。

② 丛一平主编：《西安事变研究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222页。

③ 《黎天才自传》，转见张魁堂《张学良传》，第207页。

④ 王菊人，前揭文，第156页。

⑤ 王式九，《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》，《西安事变亲历记》第306—307页。

主”的例子很多，但“今则不然。党国初建，介公统驭，非名分问题，乃人的问题也”。①

对于张杨扣蒋，中共中央也是有所保留的。中共中央在肯定张、杨的爱国动机的同时，也实事求是地指出：西安事变“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，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及其主要将领，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，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的可能”。②基于这样的理由，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周恩来并多次做杨虎城的工作，说服他释放蒋介石，这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

由此可见，在蒋介石被张、杨扣留的情况下，地方实力派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张、杨不是以扣蒋的方式反蒋，那么，地方实力派的反应很可能就不一样。至少，张、杨不至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

① 杨天石：《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》（四），《团结报》1991年1月5日。

② 《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》，1936年12月19日。载中央档案馆编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，第10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11页。